大事與小事

顏君

「告知」和「提示」是一種公衆文化，體現了一種無微不至的人文關懷，在某種程度上，它也是一個城市現代化水準與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。

到一個陌生的地方，人們最需要了解的莫過於城市公衆告知的內容，誰都希望在不需要詢問別人的情況下熟悉這個城市的一切。但在我們這裡，卻難盡人意。譬如，打出租車。在長安街的中心路段沿線，經常能看到不少外地遊客或老外大老遠就向出租車頻頻招手，可一輛也不見停下。打車人一臉煩躁、無奈、茫然甚至是憤怒，可這並不能怪司機，因爲出租車不得在長安街上下客人，他們是按規定辦事。在北京，諸如此類對於本地人也許都知道的小事，初來乍到的外地人或老外怎麼能知曉？

如此「小事」卻是外地人或老外出行的「大事」。像這樣的小事，在其他很多地方則是另一道風景。

日本的街頭巷尾，抬頭可見那些醒目的提示標誌與話語。東京街頭的消防井蓋上，不但鑄刻有消防隊員的卡通形象，四角上還標有道路的名稱，用於給人指路。避難所附近的井蓋，不僅標上醒目的箭頭，還用顏色標示到避難所的距離，一百米以內用紅色，二百米之內是黃色。

香港中環的一個地鐵站，有十五個出口，每一個通道裡都恰到好處地標示有醒目的指向牌，往哪個方向怎麼出站，出站口附近有哪些標誌性建築物，一目瞭然，並且是反覆提醒。初來乍到的人都感覺不到陌生，相反有一種到家般的溫暖。

韓國的地鐵十分發達，單是首爾的地下就有十幾條地鐵，如此衆多的地鐵你一點也不用擔心，只要記住三句話，就不會上錯車，下錯站。那就是：跟着色彩走，聽到音樂換，記住數字下。首爾的地鐵，每一條都用不同的顏色來表示，從進出口的標誌開始，一直到站台、車廂，色彩都是一致的，只要認準那條路線的顏色就絕對不會搞錯。地鐵的廣播裡，每到換乘站都會響起悅耳的音樂或是蜂鳴聲，乘客聽到音樂就不會耽誤換乘。而且，每個地鐵站都有一個編號，開頭的數字是線路的號碼，如從「大化」到「水西」一共有三十九站，「大化」爲310，水西是347，乘客看準自己是往數字小的地方去還是往數字大的方向去就行了，上車後只要記住數字，即便你不讓識韓文，也萬無一失。

曹禺寫《日出》

沈鴻鑫

今年五月，解放軍總政話劇團在北京國家大劇院戲劇場推出了新排的曹禺名著《日出》，並將赴全國巡演。六月初總政話劇團在上海美琪大戲院以此劇賑災義演，我有機會觀看了演出。這次由王延松導演，由中國國家話劇院演員陳數加盟，和郭達、靳東、翟萬臣等傾情合作，意圖以新的敘述方式對這部作品進行重新的解讀。

我曾觀看過多種版本的《日出》的演出，每每會使我想起曹禺當年寫作《日出》時的一些故事。

一九三三年，曹禺寫作了話劇《雷雨》，用自己的筆控訴黑暗社會的罪惡，描繪了舊制度必然崩潰的圖景。《雷雨》問世後，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。曹禺卻覺得意猶未盡。這些年在天津，他看到到處是荒淫無恥的官商、流氓、妓女、煙館，跑到上海，也是同樣的黑暗。在這光怪陸離的社會裡，他流蕩着，多少夢魘般恐怖的人和事時時襲擊着他的頭腦，灼痛着他的思想。一件件血腥的事實，像利刃似地刺進他的心，激起了他強烈的悲憤。多少個不眠之夜催促着他要寫一點東西，宣泄心中一腔的憤懣。一年後，曹禺又決定寫《日出》。

曹禺寫戲時常常在未動筆前就有了其中某些台詞，《日出》還沒有寫，在耳邊就縈繞着那句台詞：「太陽升起來了，黑暗留在後面，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，我們要睡了」。他寫《日出》，要表現的一個基本觀念，就是「損不足而奉有餘」的社會應該被推翻。

決定寫了，如何寫呢？是不是接照《雷雨》的寫作方法呢？不，曹禺覺得《雷雨》的結構「太像戲了」，技巧上用得過分了。寫《日出》時，他決心捨棄《雷雨》中所用的結構，不再集中於幾個人身上，而想模倣契訶夫的《三姊妹》那種平直、恬淡、舒展的風格，用橫斷面的手法，把每個角色的片斷連綴起來。於是，作品中出現了陳白露，引起曹禺寫這個人物的動機是一個眞實的人物。這個女人跟他的一個朋友很要好，她長得很漂亮，後來她上了大學，並赴美留學，回來後，跟一個有妻子的報社總編輯姘居。曹禺通過她想起了社會上許多類似的人物，他想把她寫出來。他寫的陳白露與一般的交際花不同，她在悲觀和矛盾中活着，她任性，表面上有些玩世不恭、自暴自棄，但畢竟是個認眞的人，方達生的到來曾給她燃起一線希望，然而因爲在生活中失去了勇氣，所以終於又彷徨起來，她知道太陽會升起來的，黑暗也會留在後面，然而她又知道「太陽不是我們的」。最後她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。顯然，陳白露不是健全的女性，方達生也不是理想的人物，他們痛心疾首地厭惡那腐敗的環境，都想有所反抗，然而，陳白露久經風塵，氣餒了，方達生卻是個書呆子，懷着一肚子的不合時宜。

曹禺爲了揭露社會的黑暗，造成地獄空氣的複雜的效果，在第三幕中寫了最苦的一群人。爲了寫這一幕戲，多少天寢食不安。爲了收集這一幕的材料，他穿着大褂在煙館、妓院跑。那時曹禺在天津河北女子師範學院當教授。過去妓院分高、中、低三級，第三幕中寫的是低級的煙館妓院，那裡的人愛穿短褂，看到曹禺這個文縐縐的穿大褂的人在這一帶胡同裡亂跑，租界裡很多地痞流氓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也，有的還當他是警察、密探呢！他去了許多次，最低層的那些人眞是可憐，他們流着淚，掏出心窩子的話，敘述自己的悲慘身世。劇中的翠喜，他在生活中就見到過兩次，他驚異地在「人類的渣滓」裡發現金子般的心。她們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這是社會最黑暗的一角，那裡最需要陽光。

爲了學數來寶，在一個三九嚴寒的夜裡，曹禺在一片荒涼的貧民區等候兩個嗜吸毒品的乞丐來教他唱。原來是約好的，而且許了賞錢，或許賞錢許得太多，他們懷疑他是偵緝隊之流，因此沒有來。曹禺只得忍着刺骨寒冷，躑躅到一種叫「雞毛店」的下等客店去尋找，被一個帶着八分酒意的落泊英雄誤會，險些把他的一隻眼睛也打瞎了。後來他得了教訓，喬裝打扮，請人引路，這樣一次一次到類似「寶和下處」那樣的地去，一字一字地記下那些特有的人物和特有的語言。由於他常跑那些地方，屢遭非議，嘲笑和辱罵，因此可以說這第三幕曹禺遇到最多的煩難，花費了最多的心血，他把它看作整個戲的「心臟」。可是待到劇本寫出來了，有的卻不敢演，有的藉口要求布局緊湊進行刪節，有的因找不到翠喜的角色而猶豫，「第三幕又遭遇被刪去的命運」，曹禺歎息道：「這種『挖心』的辦法，較之斬頭截尾，還令人難堪」。然而他又明確申言：「如果有人想打趣，早看出妓院材料的新奇，可以號召觀衆，便拿來胡炮亂製，我寧肯把這一幕燒成灰燼」。

《日出》寫成了，曹禺回過頭來一看，最主要的角色又漏掉了。在寫《雷雨》時，也有這樣的情況，那裡原有第九個角色，也是最重要的——稱爲「雷雨」的一名好漢，他幾乎總是在場，他手下操縱其餘八個傀儡，但沒有寫進去。《日出》呢，最重要的角色應該是確實有了陽光的人物，代表《日出》的唯一生機。對這一點，曹禺並不是沒有考慮過，他明知應當有光明的人們，也想過再寫四幕，或者整個推翻，使他的主角登場。然而他想到《雷雨》受到的種種苛待：被無理塗改、監視、禁演等等，又想到那些長着夜貓子眼睛的怪物虎視眈眈地在一旁，爲了免得可憐劇演員再受無妄之災，斟酌再三，只能採取這個下策。他只能故意叫金八不露面，他代表一種可怕的黑暗勢力，令他無影無蹤，卻時時刻刻操縱着場面上的人物。而那些勞作的人物，那擁有光明的生機的人們，始終關閉在背景後面，沒有明顯地走到前面。他在第二幕中寫到「窗外整齊地傳進小工們打地基的椿歌，由近漸遠，摻雜着漸遠漸低多少人的步伐和沉重的石塊落地的悶塞的聲音。這種聲音幾乎在一幕從頭到尾，如一群合着憤怒的冤魂，抑鬱暗塞地哼着，充滿了警戒和恐嚇」。在第四幕末尾，寫道：「天空非常明亮，外面打地基的小工們早聚集在一起，迎着陽光由遠處「哼哼唷唷」地又以整齊嚴肅的步伐邁到樓前……」「屋內漸漸暗淡，窗外更明亮起來。」這樣，在整個戲裡，太陽沒有能夠露出全面，描摩的只是日出以前的事情。然而還是寫到了希望，雖然是朦朧的，它暗示着一個偉大的未來。

後來，曾經有人問曹禺：「《雷雨》和《日出》哪一本比較好些？」曹禺說：「我答不出來。我想批評的先生們會定下怎麼叫『好』，怎麼叫『壞』，找出原則，分成條理；而我一個感情用事，素來不能冷靜分析的人，只知道哪一個最令我關心的。比較說，我是喜歡《日出》的，因爲它最令我痛苦」。

半個世紀之後，曹禺和他的女兒萬方把《日出》改編成電影，搬上了銀幕。如今又有了總政話劇團的新版的舞台劇，相信這部經典一定能走近更多的觀衆。

讀書會

沉櫻的《某少女》

許定銘

像蘇雪林、謝冰瑩一樣，沉櫻（一九〇七至一九八八）也是在民國時期開始創作，後來移居台灣的現代女作家。

山東濰縣人沉櫻，另有筆名陳因，都是由她的原名陳鎮諧音得來的，她畢業於復旦大學，一九三四年遊學日本，回國後曾在上海戲劇學校及復旦中文系任教，一九四〇年代移居台灣，在台北女子中學及大成中學教書。到台灣後，沉櫻甚少創作而專事翻譯，譯過《毛姆小說選》、《車輪下》……等多部外國文學作品。去台灣前，她曾出過《喜筵之後》、《某少女》、《夜闌》、《女性》和《一個女作家》等五本小說集。

沉櫻的小說中，只有《某少女》（上海北新書局，一九二九）是中篇，那是由五十八封信組成的小說：大學生Miss H，愛上了話劇演員C君，於是以書信展開追求；由冒昧寫信，到沉溺於愛海的獨白，到夢幻湮滅抽身而出，五十八封信都是H小姐的個人表演。沉櫻在序中說：這簡短的五十八封信裡，既沒有動人的故事，也沒有曲折的情節，但是裡面是怎樣地充滿了熱情啊，一種只有少女所特具的熱情。（頁三）

我則覺得整篇小說都是「某少女」個人對愛戀的沉湎，一種對「白馬王子」的期待而已！

人與事

文人的韻味

馮雁

陸文夫從蘇州調到南京，還隨身帶了一個皮包，皮包有時發出金屬的碰撞聲。很長一段時間裡，同事們都不清楚他那個舊不拉嘰的包裡裝的是什麼。

有一天，突然颳起的一陣大風，把辦公室的許多門窗都砸壞了。正當大家爲修理發愁時，陸文夫不慌不忙地打開皮包，從裡面拿出全部家當：一把小錘子，一個螺絲刀，還有一副扳手和幾十根釘子。原來，陸文夫手很巧，很會做事，沒多少工夫，所有被大風颳壞的門窗就被修得完好如初。之後，看到哪個房間窗子上的螺絲鬆了，陸文夫就掏出螺絲刀來擰一擰，哪裡少了釘子，他會馬上補一顆。同事們說，省文聯的房間幾乎都被他檢修過一遍，後來他都修出名氣來了，只要有東西壞了，大家都找他。東西修好了，領導和同事免不了會誇上兩句。每每這時，他總是一擺手，露出燦爛的笑容。同事說，他笑得很有成就感，樣子也很可愛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，陸文夫當選爲中國作協副主席，陸文夫是土生土長的蘇州人，好不容易碰上了一次單位分房的機會，可人們並不知道他這個官有多大，是什麼樣的「級別」，應該按什麼樣的「規格」對待。當地政府便把電話打到北京，那邊的回答也很模糊，只是說「相當於副省級」。「相當於」在幹部級別上是顯而易見的，那跟「等於」是一樣的，尤其是在幹部待遇這樣的問題上，確是絲毫不可以含糊。說的人輕巧，聽的人可嚇了一跳。事情捅出去，可驚動了地方，蘇州還沒有這麼大的官兒，只有進省委常委的蘇州市委書記才是這個級別啊。於是很快給他分了一座獨門獨院的二層小樓房。另外，還專門爲他配了一輛小車。

在新房子裡第一次接待外賓，陸文夫就鬧出了笑話。那天，他親自用小車把外賓接到家來。自古以來，蘇州就是寸金尺土的地方，雖然他擁有一座像樣的獨門獨院小樓房，可他家門口的地界並不寬敞，甚至有點逼仄，逼仄得只能容得小車，連拐彎的地方都沒有。車子靠邊，只能從一邊下人。當時，他坐在外邊，應當先下車。出於禮貌，他執意謙讓，可客人在裡邊又出不來，再三推讓之下，這位國際友人只得說了聲：「對不起！」然後躬身伸腿，確是從他前面爬了過去。

這事被文壇傳爲笑談。有一次會後閑聊，天津的馮驥才向他核實這則軼聞的眞僞，陸文夫擺擺手，什麼也不說，只是笑。馮驥才不知他這擺手是否定這是個瞎謅的玩笑，還是羞於再提那次的傻事？

還有一次，那是在一九九一年的冬天，馮驥才準備在上海市美術館辦個人畫展，他租了一輛車子，將所有畫框從天津往上海拉。車子開了一天一夜，司機太疲勞，經過蘇州時不小心打了個盹，車子便一頭扎進了路邊的水溝裡，許多畫框的玻璃都破了。

當時身在蘇州的陸文夫知道這事後，二話沒說，半夜裡動用關係找人，立刻用拖車把車子拉上來。一面安排出事司機住宿休息，一面派人把車子弄到蘇州的一家汽修廠去修理，還請人把弄壞的畫框一一仔細修理好。這才沒耽誤馮驥才三天後在上海美術館的那次成功展覽，否則就會誤了大事。事後，陸文夫也沒有告訴馮驥才。

直到畫展圓滿結束，馮驥才方曉得還有這麼一段小插曲。於是打電話給陸文夫，想表示一下謝意。可幾次電話打過去，都沒有找到他人，時間一長，把這事竟忘記了。

若干年後，馮驥才在北京開會碰上陸文夫，當面謝他，陸文夫還是伸出那雙瘦瘦的手，擺了擺，笑了笑，又是什麼也沒有說。

陸文夫去世後，馮驥才寫了一篇文章懷念陸文夫，特別寫了這些細節。可以說，這擺手之笑，就是一個人的義氣，一個人的友情，一個人的眞切。這一擺手的笑，把人與人之間的那種種客套全都揮去了，只留下一片眞心誠意。由此，我們能深刻地感受到一個人的氣質。這種氣質，一如江南水鄉的那種寧靜、平和，那種清淡與明澈，還有着綿長的韻味。

麗湖之夏 潘思蘊攝

每飯難忘矯治恩

李紀欣

手術室那位麻醉師的話，實在異曲而同工，對我的震撼一樣大！這番話，如果對家屬講，我不反對，但不明白爲什麼麻醉醫生老喜歡直接對一個無可奈何的傷病者講呢？這不是太殘忍了嗎？關於這一點，我建議醫學界尤其是外科界值得思考一下，改革一下！

凡手術，或多或少也有風險，已經是一個關，足以使傷病者憂心忡忡，再遭麻醉醫生這頓棒喝，更使我「食不甘味，寢不安蓆」。看來麻醉關尤其兇險，與鬼門關相隔咫尺而已。我向張副院長反映了沉重的心事。他安慰我說，那是照本宣科而已，叫我不必介懷。

到了手術前夕，張副院長微笑着對我說：「任教授明早一起參加你的手術。」我當然十分高興，問起緣由，原來那位腫瘤病人忽然發高熱，所以改期了。張、曾兩位教授平日都謙遜地說是任教授的學生，但我知道他們在口腔頜面外科都已經取得了很高的學術地位，是博士研究生的導師，早已是獨當一面的專家了，所以我對他們是十分信賴的。今忽聞任教授參加手術，更使我喜出望外！辛苦了三位專家，由上午八時半到下午三時半，爲我做了七小時高難度的手術，將我在口腔以內，方寸之間，多發性、陳舊性骨折逐一接駁好、固定好。至於我下頜關節的脫臼，本來準備在我左耳際切開復位，但憑他們的寶貴經驗，在口腔內手術時已順利地爲我復了位，於是我免了在顏面部捱一刀，眞要衷心感謝他們！

管我病房的劉醫生不僅一次對我說：「您老兄的面子眞大，三巨頭共同爲一個病人做手術，我從未見過。」我說：「不是我面子大，只是母校對我的關切而已。」術後爲了避免食物經過口腔，造成傷口感染，爲我插了一星期的鼻飼管，雖然有些不舒服，但我理解這是對我的細心照料，所以樂意接受。回想在香港手術後，卻一直任由我經口飲流質，對照之下，這算不算是疏忽？由於手術做得好，張口程度大有提高，牙齒咬合也明顯改進，再經橡筋牽引，兩三周內已完全康復，可以如常進食了，眞是「每飯難忘矯治恩」。

（下）

街頭黃桷蘭

王新旻

剛來成都時，走在大街上見許多女孩胸前，都懸掛着兩個或四個黃色的花骨朵，香氣四溢。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，只是覺得新奇。中國版圖上這個位於大西南的都市，與北方的中原城市相比，的確有許多的不同。在北方的城市中，是沒人會在胸前掛了花朵兒，在大街上走動的。

後來我知道了這種懸掛在成都女孩胸前的花朵兒叫黃桷蘭。我沒有見到過黃桷蘭的樹，連枝葉是什麼樣子也不知道。只是在街頭巷尾，公交站牌下，見到有許多兜售黃桷蘭的小販。多是些老太太，搬了一個小板凳，在馬路邊上一坐，面前擺放一個竹編的籃子，籃子裡就盛着許多用白線穿起來的這黃桷蘭。一般是一串兩朵。也有年輕的男孩或女孩做這生意的，他們一般是流動的，有時就在街道的十字路口，當車輛遇紅燈滯留時的片刻功夫，向車主，特別是車裡的女士兜售，成功率很高。這種黃桷蘭是不單串賣的，要買就要一下買兩串，五角錢，所以也幾乎沒人買單串，大概是找零錢不方便吧。如果是情侶，五角錢買兩串，每人一串的掛在胸前，香氣瘟氤中在街邊漫步，是一件十分浪漫有情趣的事情。後來和朋友一起上街時，禁不住好奇，就也買過幾次，用小販送的小別針每人一串的別在胸前，面對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，毫無顧忌的嘗試一種全新的感覺。

人大概就是這樣，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，就容易放下種種的擔心和顧慮，去做一些在老地方熟環境中不好做的事情。所以我想，一個想要不斷更新和超越自我的人，就一定要經常的換換地方。

環境的改變，是心情和面貌改變的一個重要前提，這是我的經驗。

文化什錦

低調人生

梅香生

做人要低調，這是古往今來多少成功人士的一大心得，是人生智慧的結晶。

清代道光年間，曾國藩算得上是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，他在十年間連升十級。在升爲正三品大員後，按規定轎要由藍色換爲綠色，但他仍乘藍轎。不久，曾國藩又升爲二品大員，按清朝官制，三品以上官員准乘八抬大轎，但曾國藩仍然坐四人抬的藍轎。曾國藩正是憑着這種低調爲人，才在錯綜複雜、險象環生的舊官場縱橫幾十年。

現代革命家朱德，一生爲人爲官十分低調。在解放戰爭時期，解放軍的條件漸漸好轉，中高級幹部的軍裝可以用「洋布」，但朱德總司令仍穿着補釘摞補釘、破爛不堪的衣服。一九四七年五月的一天，當被服廠長爲他量體做軍裝時，他特別囑咐廠長，不得用「洋布」，只能用當時軍民自己生產的小土布。廠長只得給他做了土布制服，連襯衣也是白土布做成的。朱德總司令雖然這樣低調，但卻絲毫不影響他在官兵心目中的威信。

低調做人，說白了，就是以一種低姿態示人，時時保持謙虛的品性，凡事不張揚，特別是在有了成績和功勞時，不沾沾自喜、居功自傲。低調做人，有着許多看不見的好處。保持低調，能夠結識到眞朋友。生活中，每一個人都喜歡與平等相待自己的人交心，而對那種高高在上者，只有敷衍。

保持低調，能夠聽到眞話。作爲上司，如果不能在同級和下級面前保持低調，就很難聽到眞話，而聽到的可能大多是假話、套話、恭維話。

保持低調，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。低調做人，因爲沒有浮躁之氣，不貪虛名，方能沉下身子、靜下心來潛心幹好自己的本職工作，從而有比他人更多的收穫。

學會低調做人，就要時刻提醒自己只不過是「萬花叢中的一枝」，「滄海之一粟」，茫茫人海中的一員，正確認識自己，正確看待他人，不要總是認爲高人一等，勝人一籌。所謂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，這就是樸素的辯證法。任何時候，把自己的位置擺得低些，不會損失什麼，不會輸掉什麼，只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。

佛祖釋迦牟尼說：「一滴水怎樣才能不乾？只有放到大海裡才不會乾！」這話告訴人們，一個人離開了集體，其力量是微不足道的，是沒有出路的。而一個不能保持低調的人，就像一滴離開了大海的水一樣，是逃不脫乾枯的命運的。

周正龍的騙局

舒聖祥

六月二十九日上午，陝西省政府新聞辦通報了「華南虎照片事件」調查處理情況。宣布農民周正龍拍攝的「華南虎」照片是一個用老虎畫拍攝的假虎照，雪地虎爪照片也是用事先製作的木質虎爪模具摁印的。周正龍造假，涉嫌詐騙罪，已被提請批准逮捕。十三名責任人受到行政處理。

經過整整九個多月的時間，官方終於將「周老虎」打回了「紙老虎」的原型，這實在算不得什麼令人高興的事。事實上，「周老虎」等於「紙老虎」早已不能稱之爲新聞，而是社會公衆的一致看法。人們更想知道的是，這樣一部「年度愚民大戲」會揭開一個怎樣的幕後腐敗故事？從製片人到編導主創等一干人等最終又會受到怎樣的責任追究？令人大跌眼鏡的是，熱演大半年之久的大戲，竟被調查爲：「虎照造假事件係周一人所為，沒有發現公職人員和其他村民參與造假的事實」。用一句時髦的話說，虎照造假事件，完全是周正龍一個人在戰鬥！而包括從縣政府到林業部門的所有人，都是上當受騙者，都是事件中的受害者，他們和全國人民一樣都被周正龍愚弄了。

十三人受到行政處理的原因是「在華南虎照片事件中違反有關規定和行政工作紀律與程序」。如此大而虛乏的理由，大概意思應該是要他們「爲受騙而承擔責任」。因此除一人被行政開除，兩人被行政撤職外，其他皆爲誡勉、警告、記過之類的虛罰。至於刑事責任的承擔，則只有周正龍一人被逮捕。我們就要疑惑了：周正龍一個陝西農民，何以單槍匹馬輕鬆鬥敗一整套的政府官僚系統，並且讓虎照事件「紙包火」大半年而不漏？如果只是周正龍一個人在戰鬥，他何以消解「千夫所指」於無形，何以讓歷來起效迅速的自上而下的權力問責體系，俯首低頭「傾情陪演」長達大半年之久？何況，在輿論掀起持續「打虎風暴」之後，當地政府部門的表現也與一個上當受騙者的身份太不符合了。哪有這樣的受騙者，被人騙了，不去追查騙子的詐騙行徑，不去爭取自己的權益，反而拚命去維護騙子的名譽？

說到詐騙，究竟是周正龍要詐騙兩萬塊錢？還是有人要詐騙「聞華南虎嘯」的保護區名號和旅遊區招牌呢？首先，相比於周演員的演技，公衆對周攝影家的PS技術向來是十分懷疑的，因此「替身」比「主演」更有可能符合他的戲中身份；即使周正龍自學成才，果眞學得了如此出色的PS技術，那麼，周正龍所欺騙的也只是給他發獎的官僚系統，而不是全國人民。比PS造假更可怕的是權力造假！此一事件中眞正欺騙全國人民的，恰恰是別有用心的政府部門和官員。他們發給周正龍區區兩萬元，然後卻轉身準備向上級部門和無辜遊客的腰包裡掏出一個聚寶盆來。即使僅以詐騙數額而論，誰比誰更應該被追究刑事責任？當然，因爲「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」，他們也許可以爲自己狡辯爲「詐騙未遂」；但是，全國人民的感情已經被欺騙「既遂」了，政府部門的公信力已經被損失「既遂」了，無法收拾的國內乃至國際負面影響更是已經被造成「既遂」了。

在鬧哄了大半年的虎照風波終於即將平息的時候，周正龍一個人被逮捕了，而事件中所有的幕後官僚領到的只是一張行政處罰通知單，法律對他們似乎根本無可奈何。這樣的所謂調查處理，注定只能是另一場追問風波的開始。